

双语革命者的诞生：外语能力在延安理论传播与国际交往中的贡献

常艳茹

延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DOI:10.32629/er.v9i8.7342

[摘要] 延安时期的外语能力不仅是文化人的知识素养，更成为革命进程中兼具理论建构与国际统战功能的战略性工具。本文聚焦于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背景与外语文化人群体，深入探讨外语能力如何成为推动革命理论传播和国际交往的双重驱动力。研究表明，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其体系与课程设置为培养外语文化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语文化人凭借其外语素养和革命信仰，不仅在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还在国际交流中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塑造了延安的国际形象。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外语能力在延安时期革命事业中的独特价值，为理解中国革命的国际传播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延安时期；外语能力；外语文化人；理论传播；国际交往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The Making of Bilingual Revolutionaries: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o Theoretical Dissem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Yan'an

Yanru C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was not merely a cultural literacy of intellectuals, but a strategic tool with dual function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Focusing o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group of foreign language intellectuals in Yan'a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served as a dual driving force for revolutionary theoretical dissem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Yan'an period bore distinc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its systematic curriculum and institutional setup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 solid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firm revolutionary beliefs, foreign language intellectual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Meanwhile, they built bridg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Yan'an revolutionary bas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unique value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of the Yan'an era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h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Yan'an perio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eign language intellectuals; theoretical dissemination;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引言

延安时期（1935-1948）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关键转折阶段，也是革命文化与思想体系孕育、发展的核心时期。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挥革命斗争的中枢，吸引了无数怀揣革命理想的有志之士汇聚于此，逐渐发展成为思想交流与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国际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窗口，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沟通往来，带来了多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外

语教育成为革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当时，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想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沟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革命经验，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革命人才，外语教育不可或缺。

1 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战略布局与体系构建

延安时期的外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与革命根据地建设双重语境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举措。作为战时特殊政治生态的产物，延安的外语教育实践不仅承

担着面向革命干部和文化人培养语言技能的基础职能，还特别注重培养能够理解、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推动国际革命合作的专业人才。

1.1 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战略意义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联结国际思想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外语是理解、吸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条件，延安十三年，中共中央大量依赖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尤其需要翻译俄文版的《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政治文献，因此培养具备俄语能力的翻译人才成为推动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外语教育的开展，使得延安干部和文化人能够直接阅读原文，深入理解苏联革命实践，借鉴其制度与政策，中共随之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本土化改造。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提升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需要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西方友好人士保持多渠道沟通，外语教育规划要适应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紧密结合，因此，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规划，应有一个能够统筹规划、协调管理的机构。外语工作者将延安的政治理念、抗战立场和民众形象传达至国际社会，增强了中共的舆论影响力，取得国际同情与支持。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还推动了外语与革命文化融合，重构延安知识体系。延安时期外语教育规划特征显示，外语教育的目的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完善，只有做到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完成时代使命。在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外语被纳入社会科学研究与军事政治课程中，成为延安知识系统中“革命+国际”的符号象征。外语还用于翻译苏联文艺理论，讲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集体主义伦理观、国际主义精神等，可见其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激发知识重构、重塑价值体系的思想工具。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教学，而是一项兼具战略眼光的政治文化工程，为中国共产党未来国家建设培养了具备国际素养的干部骨干，也为新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做好了知识准备与能力储备，成为延安革命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柱，其战略意义远超语言本身。

1.2 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体系与课程设置

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壮大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学习外国语是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

外语教育在延安时期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期外语教育是服务于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开始的。1941年秋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并设

立俄文系，教学目标以提高学员的翻译和口语水平为主，主要满足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旨在培养能直接阅读苏联文献、参与翻译和国际交流的复合型干部，外语课程在政治教育与文化素养课程之间穿插安排，注重语言技能与意识形态理解的同步推进；中央党校作为培养中高级干部的核心培训机构，设有专门的外语教研室，聘请俄语教师、组织内部教材，开设马列原典阅读班。

此时期学制没有硬性的规定，俄文讲习社、讲习班具有在职或业余学习的性质，多属临时性的教学模式。延安大学俄文系于1941年秋开办时，共招收80余名学员。1942年底，其中的十几名学员被挑选编入中央军委俄文学校继续学习，其余学员则按本人志愿转入别的学校学习或直接参加工作。而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基于特定的外语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外语教育条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或采用直接法，或运用语法翻译法，通常也采用鼓励学员直接参与的研究探究型教学法等等，并不拘泥于一定的程式。

但教育注重实际的课程设计和课程内容，突出“服务革命、对接实践、理论支撑”的目标。因此，延安时期的外语课程体系虽建立于物质匮乏、资源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下，但凭借其高度政治目标导向与实践驱动机制，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效与战略价值，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语言教学模式”。

2 延安时期的外语文化人及其实践

外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高等教育实践的重点之一，从中国现当代高等外语教育的历史意义上来讲，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兴办外语教育事业的新纪元，走出了中国外语教育的新路，也塑就了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的基本形态。延安时期的外语文化人通常有较为坚实的外语基础和留学经历，冯雪峰、杨献珍、丁玲等人便是其中典型，他们利用外语能力的独特优势在革命中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1 冯雪峰：俄语素养与革命文艺传播者

冯雪峰，延安时期的重要文化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重要理论家和文学家，他的文艺思想形成于左翼文学时期。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始终包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强调艺术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美学上的现实主义者，对客观再现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早年在上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并且在苏联留学期间，深入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强大的外语背景使得他能够直接理解和苏联革命理论，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传播的先驱之一。

回到延安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精通俄语的优势，积极参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工作，如《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翻译，这些翻译文献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他的翻译不仅限于文字的直译，还根据中国的历史背景进行了适当的文化适配，使得苏联和西方的革命思想能够更好地被中国革命者理解并运用，对延安的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还通过对苏联革命文献的深刻理解，提出了适合中国革命的思路与方法，为中共理论体系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加强了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系，使中国革命的文化更加多元化，且富有全球视野。

2.2 杨献珍：苏联留学归来者与理论翻译实践

杨献珍是延安时期另一个具有深厚外语背景的文化人，是大革命时期的资深共产党人，是享誉中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中国化进行的论述，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实践群众路线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精通俄语，回国后成为中共党内重要的理论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因此，他的贡献不仅在于翻译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更在于他作为文化外交使者，积极推动中共与苏联的文化与理论交流。

他的翻译工作为中共党内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视野，尤其是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列宁主义的基础》等书籍，帮助中共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球经验。此外，他还在延安担任重要的外事工作者角色：通过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联系，推动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并在中共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合作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将国际革命思想带入中国助力革命理论的创新。他通过对国际革命经验的学习与传播以及在外交工作上的努力，为中共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并获得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物资支持，扩展了全球革命视野。

2.3 丁玲：西方女性文学思想与延安革命文化融合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到达延安，参与党的各项工作推动了革命文艺发展。在上海时期，丁玲就曾以女性书写而引人瞩目，也以女作家的身份受到关注，但她对后者持拒斥态度。初到延安的丁玲，无论是在革命日常的速写、小说还是日记中都在强调“新的生活”“新的信念”，在革命的理想前“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

法语阅读能力使她能够直接接触和理解法国女权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结构。她通过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吸收，结合延安现实，提出了“文艺应当表达边区女性真实生活与情感状态”的主张。这种对个体经

验的强调，在当时强调集体主义、工具性文艺功能的延安文艺语境中，显得尤为独特。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虽以延安和边区为题材，但其叙事手法、心理描写与性别意识，明显带有西方女性文学影响的痕迹，既体现了阶级斗争意识，又保留了对女性主体性、情感世界和生命尊严的关注。丁玲的外语背景与文学训练，使她在延安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文化转换者”。她通过自身的语言与思想优势，将西方文艺中关于个体、自由、女性与社会结构的讨论，转化为适合中国革命语境的表达形式，丰富了延安时期文学的表现力与思想张力。

3 外语文化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交织下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奔向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这一潮流形成于30年代中期1938年至1939年间进入高潮至40年代初期延安聚集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

3.1 促进思想传播与革命理论建设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快速建构与深化的阶段，外语文化人通过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如柯柏年在延安期间先后翻译的马、恩、列著作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39.4）、《马恩通信选集》（1939.6）等，推动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促进中国革命走向国际化。

外语文化人直接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工作，为中共党内干部提供了第一手的原文学习资料。以冯雪峰为例，他精通俄语，积极参与《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翻译，不仅提升了延安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推动了理论在中国土壤中的扎根与本土化改造。延安时期出版自由的实现，给延安地区的出版事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此外，外语文化人将理论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日常生活为参照，将理论改编为简单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中，在大众中普及。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将革命形式与陕北当地的民歌结合起来，创作出《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党听》《望延安》等脍炙人口的民歌。其中，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周恩来为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外语文化人通过自身的实践和对群众生活的深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作品中，创作出群众愿意接受的、鲜活的文艺作品，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从根本上促进思想传播与革命理论建设。

3.2 加深国际交流与中西文化融合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政党，逐渐意识到国际因素对于稳定中国国内政局的重要性，认为应当主

动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积极宣传红色文化，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外语文化人积极参与新华社、《解放日报》外文组、延安广播台等机构的对外发声工作，撰写英文、俄文新闻稿，翻译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讲话，为中共构建了早期的国际传播机制，对外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立场和政策，有效提升了“红色中国”的国际可见度，建立了自己的国际话语阵地。通过接待外国友人，外语文化人直接参与文化外交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外政治互信，也增强了中国革命的物质保障与战略认同。

更为深远的是外语文化人在文学与思想领域的文化融合实践。丁玲以“延安视角”改写西方话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女性革命书写，开辟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结合的文化转译路径。冯雪峰认为丁玲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变换的过程，“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出的正是“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新的主体意识与固有环境的严重不调和，这正是丁玲在同期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表明的观点：“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并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

外语文化人不仅是延安时期对外沟通的翻译者，更是国际思想资源的转化者与融合者。他们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语言服务层面，更在于他们以语言为通道，实现了中共革命的理论提升、文化扩展与国际嵌入，构建了跨语言、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的沟通桥梁，是延安红色文化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与铺路人，为延安革命赋予了世界视野与未来想象。

4 结论

延安时期的外语文化人，凭借其扎实的外语背景和丰富的国际经验，成为连接中共与国际社会的重要桥梁，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资源，并促进了革命思想的国际化和传播。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具备国际视野的革命人才，他们不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还通过推动国际革命思想的传播，增强了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为后来的文化与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在推进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重审延安时期外语文化

人的角色与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为当代中国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文化表达提供了独特且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34.
- [2]丁玲.《写给青年女作者》[M].《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4-127.
- [3]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1947年),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99.
- [4]高歌,高治东.《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特色及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74-76.
- [5]蒋明敏.《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5):112-118.
- [6]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J].外国语,2010(1):2-8.
- [7]刘庆和,李珍军.《著名马列原著翻译家柯柏年》[J].人物春秋,2011(10):23.
- [8]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0.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 [10]宁建花,沈骑.《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规划——以延安外国语学校为中心》[J].中国语言战略,2020.10(01):138-148.
- [11]欧海蓉.《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阐发》[J].党史博采(理论),2016(08):24-26.
- [12]王杰.《学府秋忆:中国大学精神历史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21(164).
- [13]张正光.《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06):155-159.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7.
- [15]朱鸿召.只读《解放日报》[J].上海文学,2004(02):78-87.
- 作者简介:**
常艳茹(1998-),女,汉族,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